

核心阅读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涵盖多学科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呈现中国考古理念和技术的进步。评选活动以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网上全程直播终审会等形式,让考古工作走入公众视野,展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考古学人的风采。

202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的金挂饰

中国最早的粮仓城是什么样的?最早的古代大型宫殿式遗址建筑形制是什么样的?4月13日,备受关注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入选。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共有20项入围,最终评审出10项入选。据介绍,入围终审的20项考古发现分别来自全国15个省市区。入围终审的20项考古发现地域分布比较均匀。从年代分布来看,史前考古有6项、夏商周考古有4项、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有6项、唐宋元明考古有4项。从遗址类型来看,以居址、墓葬和城址为主,还有2处祭祀遗址和1处烽燧遗址。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出土的鼓吹仪仗俑

解开未知 牵引新知

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新资料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入选十大发现有的是“考古中国”项目新成果,也有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新发现,这些项目涵盖了现代人起源、文明起源、夏文化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丝绸之路考古等重要学术领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说,最终入选的年度考古新发现,有其考古发现突出的“新”意义。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粮仓城,为研究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的粮食储备、统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贡赋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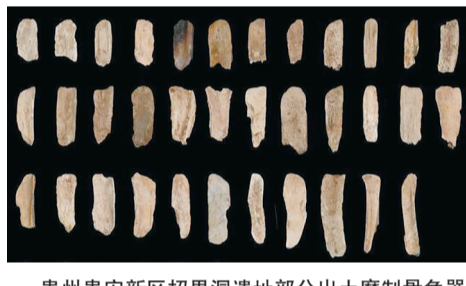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在大中型贵族墓葬群中,部分中小型墓内还发现有放置马牛羊头蹄的殉牲现象,与春秋时期中国西北地区人葬习俗相同。从徐阳墓地时间跨度及所处位置分析,它与“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的陆浑戎相吻合,应为陆浑戎遗存,其所在的顺阳河流域应为陆浑戎迁伊川后的聚居

地和核心区域。该发现为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重要资料,其所表现出的文化融合与嬗变,是中原华夏文明的先进与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考古中,3座墓葬尤其是焦村M25与中兆村M100,不论是整体形制、布局还是随葬器物,既有显著的中原传统汉文化特点,又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为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资料,体现出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本次发现的彩绘土雕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接近中国传统古代土木建筑原型的实例。

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出土器物丰富,有陶器、铜器、木器、扣器、石器、铁器、草编物、纺织物、金面饰、金挂饰、料珠、动物骨骼、人骨、木棺等。桑达隆果墓地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当地先民们有同时随葬明器、实用器两类器物的传统,以及随葬食物和毁器的习俗。种种发现,体现了以札达县为中心,来自于其西部、东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传播至此的痕迹。

2013年至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进行了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通过发掘,确认该城晚期为金元之际东北地方割据政权东夏国南京城故址,早期或与大柞菜“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国之城有关。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部分出土磨制骨角器



河南淮阳时庄遗址地上式粮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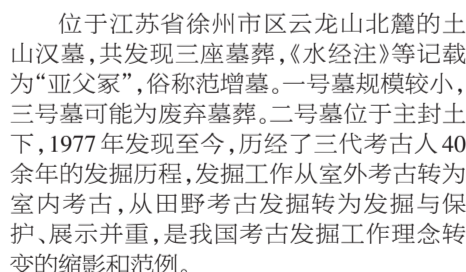
河南伊川徐阳墓地大型墓葬出土铸铜



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出土的玉石耳杯、盘、勺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



位于江苏省徐州市区云龙山麓的土山汉墓,共发现三座墓葬,《水经注》等记载为“亚父冢”,俗称范增墓。



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出土的东夏国时期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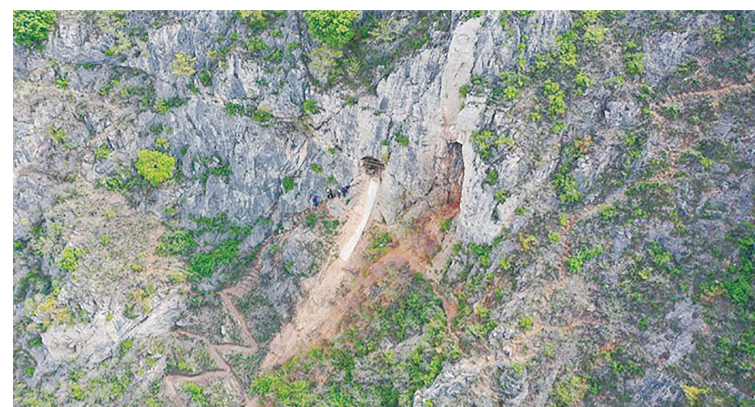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出土的牙雕象蚕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的人形金箔

仙人洞旧石器时期遗迹: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



地处悬崖峭壁、逐水而居、面积约30平方米……在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的仙人洞旧石器时期遗迹,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

地处豫西山地和淮河流域过渡地带的鲁山地区旧石器考古调查项目始于2019年,考古人员在此发现46处洞穴,其中10处洞穴有人类活动痕迹;仙人洞是今年考古发掘的重点。

“洞长9米,宽3米,高3.9米,洞内面积约30平方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山地区旧石器考古调查项目负责人赵清坡说,“与周边发现的40个洞穴相比,仙人洞在古时候算一个‘豪宅’了,基本上能住10个人左右。”

那么,古人类为何不选其他洞穴而选仙人洞居住?

赵清坡推测,古人类实际上就是以生存为前提,通俗一点讲就是为了活着,出于本能会选择安全、环境气候适宜、离水源比较近的洞穴,不仅避雨挡风,还可防御野兽攻击。

赵清坡说:“在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是不会制作盛水容器的,那么他们肯定会首先选择一个离水源很近的地方,这也是古人类生存智慧的体现之一。”

仙人洞处于鲁山县观音寺乡境内一座山峰陡壁上,海拔576米,距现代河谷垂直高度为193米。从山下仰望,仙人洞若隐若现;从山上俯瞰,洞幽谷深、陡峭险峻。笔者跟随考古队攀爬近一个小时崎岖山路后,才能近观

仙人洞的鬼斧神工。踏入洞内,顿感豁然开朗,别有洞天。

据赵清坡介绍,仙人洞于2020年6月首次发现,洞内发现有人化石、动物化石、石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同年9月首次对仙人洞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

目前,仙人洞遗址发掘出动物骨头1万余件,但破碎严重,目前可鉴定的种属有牛、马、羊、熊、鹿、猪、大型食肉动物及一些啮齿类小型哺乳动物等,大多数最大长小于2厘米。其中,还出土有动物化石、人牙、头骨断块等。

赵清坡说,采用碳十四法测定,仙人洞出土的一件羊牙年代为距今3.4万年;采用铀系法测定,一件动物肢骨最高年代为距今至少3.7万年。

旧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从距今约300万年开始,一直延续到距今约1万年。

“仙人洞测年符合旧石器时代的时间跨度。”赵清坡介绍说,旧石器时代典型特征主要是人类使用打制石器作为劳动工具。“在洞内发现一件直径3厘米的砾石,有一定磨圆度,应是被带入洞内,洞里还发现一枚有砍痕的动物肢骨。”

在考古工作队驻地,赵清坡拿出一枚马牙化石介绍说,“正常马是进不了洞里的,那么就很有可能是人带进去的。再结合刚才说的一些动物肢骨上的一些砍痕,就比较确定是人的一个行为,证明当时人类已经在这个洞里面居住了。”(中新)

“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重光——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背后的故事

千百只手臂自崖壁上次第展开,如层浪叠涌;万般姿态的手掌,或五指平伸,或轻拈法器,似花绽放;金光灿灿的主尊观音造像盘坐莲花宝座,慧目下视,慈悲安详……这便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大足石刻千手观音。

这尊高达7.2米、宽12.5米,面积达88平方米的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位于重庆市大足区宝顶山大佛湾,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重要代表作,被誉为“世界石刻艺术之瑰宝”。

西南地区的荒山野岭中,缘何留下这一绝国宝?端坐崖壁800多年的千手观音何以历久弥新?

往事越千年。唐宋之际,随着中原王朝政治经济中心逐渐南移,承接北方石窟造像之衰,川渝石窟寺建造迎来高潮。

1174年前后,南宋昌州(治今大足)米粮里僧人赵智凤,来到宝顶山,沿着奇峭嶙峋的岩壁围建一座佛教道场的想法油然而生。其后数十年间,叮叮当当的凿刻声在这里回荡,数以千计的佛像破石而出。千手千眼,气势恢宏的千手观音造像就此诞生。

“观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孺皆知的一个形象。早在宝顶山石窟营建之前,千手观音以绘画或雕塑的形式大量出现在各地佛教寺院,但宝顶山千手观音,规模之宏大、工艺之精美、影响之深远,世所罕见。”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学研究中心主任米德明说。

时光荏苒,进入21世纪,这尊千手观音造像在长年累月的风侵水蚀下,加速病变。2007年,千手观音一根手指掉落。

保护刻不容缓。2008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抢救加固保护项目,并将其定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当时共发现石质胎体风化、贴金层开裂、彩绘脱落等各类病害34种。”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说,如此大规模、综合性石质文物保护,没有先例可循,为此专门汇聚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10多家文保、工程单位近百名专家和技术人员联合“诊疗”。

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观察等现代科技在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中得以应用……随着千手观音本体修复进入关键阶段,一个个意想不到的难题挡在了保护人员面前。

造像金箔加固需要稳定耐用的黏合剂,最初采用北方常用的



牛胶材料,但试用后水土不服,很快长出了白色绒毛。“项目组经过反复比选、试验,最终选择了西南地区传统的大漆材料,并改进工艺,终于解决了难题。”陈卉丽说,这一过程耗时近3年。

“千手千眼”的观音造像,手的形态极其复杂多样,是修复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对每一根手指、每一处细节进行认真勘察,保护团队先后完成1032张调查表的填写和20000余张现状照片的拍摄,收集约35000个数据,分门别类施策,逐一修补。在此过程中,还第一次真正摸清了“千手观音”手的数量——830只。

在修复工程收尾阶段,保护人员被最后一根手指难住了。这是主尊右前伸的右手,自腕部残缺,现存手掌及掌心红布帕为后人用水泥补塑,是一只“假手”。虽经查阅大量资料和多方实地考察,仍然无法找到原始依据。

在大足石刻从事文物修复20余年的陈卉丽,大胆提出了一个方案:对照观音造像另一侧手形,采用“可拆卸”的修复方法在断手处接入一只“新手”。既实现文物完整性和艺术性,也为未来修复留下了空间。这一方案最终得到专家认可。

经过近8年修复,投入各类修复材料约一吨、金箔44万张,2015年6月13日,历经800多载沧桑风雨的千手观音金光重现。

“修复只是保护工作的一个新起点。这几年我们不断总结提升,把好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到更多的石窟寺保护中,同时深入挖掘千手观音造像的历史、文化价值。”站在宝顶山崖壁上,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说,为了将包括千手观音在内的宝顶山石刻完好地留给下一个千年,仍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新华)

多学科合作 体现考古过程的科学性

多学科合作,是今年考古新发现的共同特点。考古发掘综合运用考古地层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质考古、冶金考古等。课题意识的贯穿、科学技术的加入、多学科的交叉,让考古发现呈现了更多的科学性。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十分罕见。环境考古工作采用了地层沉积物代用指标和石笋古环境代用指标并用的方法。其中直接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系国内首次,目前已经获得其中几根石笋的精确年代模型,并对石笋进行显微观察,发现石笋纹层内含有许多木炭碎屑,与文化层堆积中的用火强度高耦合,推测系古人类在洞穴中用火的纪录,最早可追溯到至少1万多年前。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为热水墓群结构最完整、墓室最复杂的高等级墓葬。地上墓园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东西两壁用涂红彩的斗拱装饰,这些元素带有明显中原文化特征。另外墓葬出土的木构建筑模型,与

道教相关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丝织物,充分证明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及影响力。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建华说,我们在发掘过程中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采用全站仪、无人机等技术手段,树木年轮、三维建模、动植物考古、DNA、金相分析等检测鉴定方法,全面、翔实、准确地记录和提取相关信息。

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滨贝丘遗址,也是浙江和长三角地区首个贝丘遗址,为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国沿海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提供了独特案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介绍,2018年,根据该遗址文化堆积的超大埋深(距地表5到10米)和被海相沉积覆盖的低海拔埋藏环境(-3到-8米)的特殊性,发掘之前由工程部门建设一个围护发掘区的钢结构基坑。2019年9月到2020年8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750平方米。

公众通过直播见证考古新发现“诞生”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是年度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向业界及公众汇报最新研究成果、普及考古知识的重要平台。活动举办的30多年,是考古工作不断走入社会公众视野的30多年,也是考古事业融入社会文化发展的30多年。评选活动采取的一切形式,其目的都是为了公众更深刻感受考古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参与和分享考古学对构建民族历史、增强文化自信的独特贡献。

本届评选在保持学术性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考古学人的风采。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遗址由西藏自治区

文物保护研究所负责挖掘,挖掘团队主要由女考古工作者组成。该项目汇报人何伟介绍:“我们团队以女性为主,所在的发掘区域风吹日晒,高寒缺氧,我们一直在海拔高度4200多米的高原上工作了4年。”考古工作者的经历,打动着线上线下观众。

近年来,“考古发现+全网直播”成为一种向公众展示考古工作成果的新渠道。三星堆考古挖掘直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0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线上直播……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和发现,通过直播等方式,及时向公众传递考古成果,传递考古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人民日报)